



从左至右：梁漱溟、马一浮、熊十力

【名家背影】

悬解终期千岁后

□肖复兴

如今，我们的学界和文坛没有这样“悬解终期千岁后”的争论，只有甜蜜蜜的评论，我们便当然也就没有熊十力和梁漱溟、马一浮这样的大师。

熊十力是当代大儒，当年，他曾在梁启超主编的《庸言》杂志上发表文章，批判佛教思想。当时，梁漱溟两次自杀，舍身求法，一心向佛，笃信非常，岂容熊十力对佛教如此亵渎？便发表长文《究元决疑论》，指名道姓痛斥熊十力愚昧无知，词语尖利，如火击石。战火挑起来了，学界一时大哗，熊梁二位，都是大家，各自拥有的学问和文字，都是各自的利器，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。

谁知，没有出现一些人们料想的战火。熊十力认真读完梁漱溟的文章之后，并没有动肝火，相反觉得梁漱溟骂得并非没有道理，开始认真钻研佛教，但道理究竟在何处，他一时尚未闹清。于是，他修书一封给梁漱溟，希望有机会得一晤面细谈请教。梁漱溟很快回信，欣然同意。两人这一年便在梁漱溟借居的广济寺会面，相谈甚欢，相见恨晚，一语相通，惺惺相惜。

从此，两人建立了长达半世纪之久的友谊，传为令人钦佩而羡慕的佳话。后来，梁漱溟遭受批判，熊十力多次站出来为梁漱溟说话，显示出二介书生的肝胆相照的勇气。而梁漱溟在熊十力最为落寞、学术界毫无地位可言的晚年，不仅写出《读熊著各书书后》，并且摘录《熊著选粹》，极力张扬熊说，以示后学，显示出高山流水知音相和之情和患难与共的友情。

马一浮是当代另一位大儒，熊十力和他的交往，也很有意思。马一浮是有名的清高之士，孤守西子湖畔，唯有和梅妻鹤子、朗月清风相伴，凡人不见。熊十力托熟人引见，依然不

果。但是，学问的吸引，惺惺相惜，渴望相见之情愈发强烈，想不出更好的法子，熊十力便径自将自己的《新唯识论》寄给马一浮，希望以彼此相重的学问开路，从而叩开马一浮的西子之门。谁知，数十日过去，泥牛入海，依然是潮打空门寂寞回。

熊十力正失望的时候，忽然自家屋门被叩响，他推门一看，竟是马一浮。马一浮正是读完他的《新唯识论》后，对他刮目相看，同梁漱溟一样，和他相见恨晚，相谈甚欢。彼此对于学问的共同追求，是搭建在心与心之间最后的桥梁，再遥远的距离，也就缩短了。从此，两人结下莫逆之交。后来，《新唯识论》一书便是马一浮题签作序出版的。

但是，再好的朋友也是两人平等相处，决非一人是另一人的影子。更何况都是各持一方学问的大家，性情中人，自尊和自傲之间，矛盾和摩擦总在所难免。

抗战时期，马一浮在四川乐山乌龙寺办复性书院，请熊十力主讲宋明理学。熊十力作了开讲词并备好讲义，没想到和马一浮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。学问家各自的学问，都是视之为生命的，楚河汉界，各不相让。争论之下，各执一词，坚持己见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居然闹得不可开交，一时竟无法共事，不欢而散。这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结局，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，同时，又是无法避免的结局。

可贵的是，事后，两人没有意气用事，而是都冷静下来，和好如初。不同的见解，乃至激烈的争论，对于上一代的学问家来说，

不会影响彼此的友情，相反，常是友情能够保鲜和恒久的另一种营养剂。

1953年，熊十力70岁生日时，马一浮特写下一首七律，回顾了他们几十年的友谊：“孤山萧寺忆清玄，云卧林栖各暮年。悬解终期千岁后，生朝长占一春先。天机自发高文在，权教还依世谛传。刹海花光应似旧，可能重泛圣湖船。”在这首诗中，马一浮还在说当年争论的事情呢，而且，不止是一次争论，而是一直都没有和解，一直都在各自心里坚持，和解是要“悬解终期千岁后”。但是，这样的争论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，这首诗中传达出马一浮对熊十力的友情，让熊十力非常感动。熊十力很珍视马一浮的这首诗，一直到晚年依然背诵得很熟。

文化大家之所以被称之为大家，在于他们各有各的学问，也在于他们各有各的性格。按研究这些大儒的学者分析，就性格而言，熊十力和马一浮相比，一个“简狂”，一个“儒雅”；熊十力和梁漱溟相比，一个有似于《论语》中所说的“狂”，一个则如《论语》中所说的“狷”。只有学问的不同，没有门户之见；文人不相轻，重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学问，相反却可以寻求“求己之学”、相互渗透的志趣。性格的不同，不是有你没我，而是可以获得“和而不同”、互补相容、相互裨益的效果。那包容的胸怀，令人景仰。

如今，我们的学界和文坛没有这样“悬解终期千岁后”的争论，只有甜蜜蜜的评论，我们便当然也就没有熊十力和梁漱溟、马一浮这样的大师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)

【社会观察】

『管闲事』的艺术

□房伟

“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”这句古老谚语，意在提醒人们莫管闲事。半年多在台湾访学交流的经历，却让我对这句话有了不一样的理解。

我平时主要在东吴大学图书馆读书写作，不时去其他大学和科研机构做讲座，参加一些文学活动。我也喜欢在台北的街头闲逛。台北干净整洁，忙碌但不嘈杂，行人大多行色匆匆，人与人之间彬彬有礼。我有一次却意外见识了台湾人如何“管闲事”。

一个冬日下午，我和淡江大学的杨教授去旧书店“淘书”。杨教授儒雅谦逊，对内地文学界的朋友非常热情。他给我介绍了不少台湾旧书店的故事。我们正言谈甚欢，突然被路边一个骑脚踏车的中年女士拉住了。那位女士三四十岁，严肃地对我们说，两位先生，你们看那里是怎么回事？

我们顺着声音看去，路边有一对青年男女，看样子像是恋人。他们在激烈地争吵着什么。男孩高高的个子，染着黄头发，打扮时尚，情绪非常激动，不断拉扯推搡女孩。女孩长发披肩，长得比较柔弱，此时轻声哭泣着，也抵抗着，但似乎并不奏效。

要怎么办呢？我有些茫然。恋人争吵，也属正常，但如此拉扯推搡，如若不管，于情理和道义也说不过去。况且，如果事态继续恶化，说不准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杨教授见状，马上拨打当地报警电话，并和我及那位女士一起走上前。我们三人守在周围，杨教授告诉我，如果男孩继续有过激举动，他希望我和他一起上去阻止。

我也暗自下定决心，只要男孩敢打人，我也要做一次“雷锋”，仗义干预，真正管管“闲事”！

所幸，男孩看到我们围上来，停止了对女孩的攻击。杨教授则和我隔开了女孩，等待着警察的到来。男孩倒是没有恼怒，只站在一边喘着粗气，不说话。

只过了两三分钟，一个骑着电动车的男警察就迅速赶到现场。他到了以后，立刻隔离男孩与女孩，并询问情况。看到现场有女生，男警察马上呼叫对讲机，又叫来了一名女警察来处理。女警也在几分钟后赶到。随后，又有一名警察赶来。他们三人分别将这对男女带到附近的派出所。

看到事情处理完了，那名第一时间发现情况的中年女士才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并向我们道谢。她冲着我们笑了笑，随后礼貌道别。就此我和杨教授也交流了一番。我夸奖他有道德担当，他却淡淡地说，这本是很平常的小事。

这让我感受到文化差异，也让我反思到了很多东西。我从中既感受到了公民自觉意识，也感受到传统文化里浓浓的人情味以及警察的细致和责任心。真正的公民意识，是在懂得个体自由与尊严的基础上，也懂得尊重他人，并担负公共空间的公民责任。冷漠的公民，其责任心的匮乏，看似只管自己的利益，实际上不过是“原子化生存”，人如果不能为他人，那么他人亦不能为己。浓浓的人情味，则是中华文化的美德。中华文化有悯弱救孤的优良传统，那种对陌生人的关爱，更能让人感受到人性的温暖。台湾警察很有礼貌，处理一件小事，也能反应迅速、思虑周到、细致谨慎，不能不让我佩服。

当然，更让我深有感触的，还是这一次老百姓“管闲事”的艺术。这并不是说内地的百姓和警察都做得不好，虽然存在某些问题，但我们也从来不缺乏道德高尚的好人以及有责任心的公务人员。但要勇于“管闲事”，又要懂得保护自己，保护别人，这就需要耐心和技巧，也需要更多责任心和理性意识。我们有时候做得就比较“粗放”了。这也不能不让我联想到我们面对公共空间突发事件的反应，有的人甚至冷漠躲避，老太太摔倒了没人扶、路上轧死人没人管之类消息屡屡见诸报端。每当看到类似消息，心里总是沉甸甸的。台湾地方不大，很多建筑都有精致之美，台湾人做事也有着特有的细致周到。这次“管闲事”的经历，虽然是一件小事，却让我难以忘怀。

(本文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台湾东吴大学访问学者)